

誰是「我們」及其「敵人」

● 遇資州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文革開始，我才曉得自己的出生日剛好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同一天。我興奮了好久，許多年後才感覺不對：這一天可能是不祥的日子。

「延安文藝座談會」不過是「延安整風」的插曲，我一直以為那是知

識人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德熱情，從來沒有想過也可能是政治陰謀。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使真相大白：原來「整風運動」與我經歷過的文革沒有甚麼兩樣。

高華僅長我兩歲，卻早我多年走出「文化革命」的魔咒，文革後期就想到要解「延安整風」之秘，我讀他先知先覺。「延安整風」對共產黨文化制度的形成乃決定性的，但官方史學從來沒有提供運動的真實細節。高著積十餘年之功，從大量史料中拼接出「運動」歷史的馬賽克圖畫，那些縫隙是由無數人的血和死者的頭髮絲填滿的。對這段共產黨歷史的細節，高華顯得比許多過來人還瞭如指掌。過來人知道的僅是自己經歷的事，高華敏銳釋讀各類「級別」的人的回憶，掌握了整個運動的「來龍去脈」。

史學不僅描述，還需要解釋；不僅要搞清「來龍去脈」，也得解釋「歷史含義」。高著力圖擺脫共產黨「意識形態的解釋學」，「從實證研究的角度，以分析性論述的方式展開」（頁654）。既然是「分析性論述」，就不可能沒有立場。在「後記」中，高華提到自己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個

「延安文藝座談會」不過是「延安整風」的插曲，我一直以為那是知識人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德熱情，從來沒有想過也可能是政治陰謀。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使真相大白：原來「整風運動」與我經歷過的文革沒有甚麼兩樣。

高著一再「實證地」表明，「延安整風」明明是一派黨知識人整肅另一派黨知識人的「思想革命」。的確，共產黨靠動員農民實現政治理念，但啟蒙知識人始終是共產黨革命的主體，農民最終不過是革命對象。用農民政治習氣來界定毛式政治運動，雖在學界流行，實際是中國史學中未經審思的觀點。

人觀點。我不懂史學家法，只能就史家的觀點說些行外話。

「延安整風」通常被定性為一場「極左」的政治運動：儘管「整風」對於中共擊敗國民黨、統一中國起了積極重要的作用，但「運動中的某些概念、範式以後又對中國的發展和進步產生若干消極作用，極左思想、權謀政治匯溪成流，終至釀成建國後思想領域一系列過左的政治運動直至文革慘禍」（頁655）。事實上，高著充分證實了共產黨黨歌中的一句歌詞：「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因為，沒有毛澤東，共產黨早就完了。「延安整風」儘管相當殘酷、極左、陰謀，其實相當必要。毛澤東不愧為真正的政治領袖，一向十分清楚「誰是我們的敵人」。抗戰初期，毛主席統一戰線是策略、打游擊戰而非運動戰，證明他真的英明偉大，只有他明白：共產黨的真正敵人是國民黨，日本人入侵給瀕臨絕境的共產黨帶來天賦良機，應該休養生息、暗中擴充軍事實力。黨內書呆子們不懂何為政治，聽斯大林的話，殊不知斯大林是俄國人，要中共把統一戰線作為政治原則，不過想要國共合作替他們抵擋日本人。從黨的生命和使命來看，毛搞整風奪取黨的最高領導權，可謂歷史危難中的當仁不讓。說到殘酷，現世政治有過不殘酷的嗎？所謂「極左」，不左還算共產黨？至於權謀，那是中西方傳統政治智慧都高揚的「道術」，韋伯（Max Weber）和伯林（Isaiah Berlin）都稱讚的馬基雅維利式政治「責任倫理」。通常的「極左論」，其實沒有走出「意識形態的解釋學」（黨正是這樣總結

歷史經驗的），從「政治倫理」來看也不地道。

高著的立場與此不同，作者持有的是「至今還深以為然的五四的新價值：民主、自由、獨立、社會正義和人道主義」（頁655），「整風」就是整掉黨的「五四」習氣。難怪高著在「實證研究」中不時抑制不住要同情「受害者」。可是，「整風」是黨的運動，黨要搞運動，我等黨外人沒有置喙餘地。共產黨不是自由黨或社會民主黨，向共產黨要求「民主、自由、獨立、社會正義和人道主義」，可能一開始就找錯了人。「整風」中受迫害的知識人，誰不熱愛共產黨？受迫害為甚麼不逃離延安（書中僅提到兩例逃出）？經過運動後，受迫害者不大都變成了以後「運動」中整人的人？

作為非官史論著，究竟該如何看待「整風」的歷史含義？高著指出：毛澤東通過整風，奪取黨內最高權力，豎立毛澤東思想，乃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政治行動（頁178-83）。這聽起來仍然屬於「意識形態解釋學」，但解釋卻有所不同。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堅決拋棄一切對現實革命目標無直接功用的理論」（實踐論）、「全力肅清五四自由、民主、個性解放思想在黨內知識份子中的影響」、將農民作為「中國革命主力軍」、傳承宋儒的教化方式，「交替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懾的手段，大力培養集忠順與戰鬥精神為一體的共產主義『新人』」（頁304），從而「為中國傳統因素大規模浸潤中共正式打開了大門，使原來就深受農民造反傳統影響的中共，更加顯現出農民化的色彩」

(頁182)。如此看來，「延安整風」不過是傳統的農民政治習氣復發，是所謂中國「反智主義」政治傳統的現代化。

真是這樣嗎？高著一再「實證地」表明，「延安整風」明明是一派黨知識人整肅另一派黨知識人的「思想革命」。所謂「民族化共產主義」首先由國統區的「自由」知識人提出來，走中國自己的現代化道路也是由梁漱溟這樣的「最後大儒」首先提出來，毛澤東不過與這些知識人志同道合，通過共產黨的政治改造實現了這一理念。「整風」一靠康生掌控的特工部門，二靠從國統區來的左傾知識人精英（陳伯達、胡喬木）掌控的文宣部門（頁192-200）。無論陳、胡還是康，與毛一樣，都是啟蒙後的現代知識人，哪裏是甚麼傳統農民政治習氣復發。的確，共產黨靠動員農民實現政治理念，修改了國際共運的工人主義原則。但農民始終是在「主義」知識人領導下革命的，高著一開始就提到，毛澤東對掌握農民而不是被農民所掌握有充分的意識，堅持建立基層黨支部。啟蒙知識人始終是共產黨革命的主體，農民最終不過是革命對象。

用農民政治習氣來界定毛式政治運動，雖在學界流行，實際是中國史學中未經審思的觀點，它可能源於某史家製造的謠言：中國政治具有「反智主義」傳統。中國的「古之道術」可謂再理智不過了，現代中國政治家中，還有誰比毛更理智、更精明、更審時度勢、更懂「現實」政治？所謂「浪漫主義政治」，絕非憑個人想像和熱情胡搞政治，而是一

種針對西方普遍主義的民族政治理念，其實際的政治行動相當理智、現實。被看作「延安整風」之延續和擴大的文化革命，相當程度上源於毛極為「現實」、理智的政治洞察：「我們」的「敵人」變了，不再是美國人，而是俄國人。黨內的書呆子察覺不到現實中真正的「敵人」，只知道經濟建設，不曉得國家在俄國人的威脅下已經危如累卵。

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確如「意識形態解釋學」說的，是「主義」原理與中國實際的結合。甚麼「原理」？何種「結合」？「原理」就是被西方強權國家壓迫的民族要求平等權利，結合「中國實際」，就是只有動員農民完成中國統一大業，才能真正與現代東狄西夷重新劃分世界範圍。問題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後畢竟還是馬克思主義，這是政黨理念，信不信是黨的「我們」的事，馬克思主義是否「中國化」，與非黨知識人的我們何干？「整風」如果只整黨人和熱愛黨的人，就沒有甚麼不正當。文化革命不正當，是因為黨強迫所有知識人都成為黨的「我們」，都信奉「左派」，不然就往死裏打。我有一位友人，博學多才且兼通中西，60年代初就感到生存危險，辭去北大教職，靠為外文出版社翻譯中國古典文學為生。他以為不做單位人就可以躲掉「我們」，文革來了照樣被抓回來批鬥，直到打聾耳朵算數。這才是不幸。

黨的「我們」是為了對付「敵人」聚集起來的。百餘年來，中國的「敵人」主要是先發起來的東狄西夷。抗戰前，投奔共產黨的小知識人並不

高著堪稱相當紮實的
非官修中共黨史的典
範之作，但也坦露了
當今知識人仍然缺乏
可以清楚辯護的立場
，提出了如何走出黨
的「我們」的問題。
面對當今「新左派」
的「我們」強暴史實
，過度解釋「延安民
主」、「鞍鋼憲法」
所謂的偉大「歷史意
義」，史學家們不僅
需要糾彈史證，也得
面對「政治解釋學」。

多，如高著所述，由於共產黨顯出積極抗日的姿態，才吸引許多知識人投奔共產黨的「我們」。如果認同中國的「敵人」，文化革命要求所有中國知識人都成為黨的「我們」，也沒有甚麼不對。高著在中國現代史學上堪稱突破，堪稱相當紮實的非官修中共黨史的典範之作，但也坦

露了當今知識人仍然缺乏可以清楚辯護的立場，提出了如何走出黨的「我們」的問題。面對當今「新左派」的「我們」強暴史實，過度解釋「延安民主」、「鞍鋼憲法」所謂的偉大「歷史意義」，史學家們不僅需要糾彈史證，也得面對「政治」解釋學。

荒謬與智慧的文本

● 倪樂雄

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卡特和前國防部長佩里合著的《預防性防禦》提出的思想分幾個層次，就其最高層面而言，整個軍事、外交政策是建立在「防患於未然」、「居安思危」的基礎之上，這是作者從自己國家的最高利益出發，總結了本世紀美國兩次被動地捲入世界大戰歷史經驗後提煉出來的。



艾什頓·卡特、威廉姆·佩里著，胡利平、楊韻琴譯：《預防性防禦：一項美國新安全戰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卡特 (Ashton B. Carter) 和前國防部長佩里 (William J. Perry) 合著的《預防性防禦：一項美國新安全戰略》（以下簡稱《預防》）是一本研究美國現行軍事、外交政策和行為的重要著作，汪道涵和王逸舟分別為此書的中文版寫了序言和導讀。它的重要性之一就是作者不僅在位時按照這一思路行事，而且他們的繼任者在目前和將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仍然按照書中的觀念行事。

筆者在仔細拜讀後認為，作者提出的預防性防禦思想分幾個層次，就其最高層面而言，整個軍事、外交政策是建立在「防患於未然」、「居安思危」的基礎之上，這是作者從自己國家的最高利益出發，總結了本世紀美國兩次被